

後五四知識女性個人記憶書寫中的母女關係 考察：以齊邦媛《巨流河》、楊靜遠〈母親 袁昌英〉為例

龔月婷*

名古屋大學人文學研究科博士後研究員

*通訊作者：龔月婷

通訊地址：Nagoya University, Furo-cho, Chikusa-ku, Nagoya, Aichi 464-8601, Japan.

E-mail: gong_yueting@yahoo.co.jp

投稿日期：112 年 12 月

接受日期：113 年 2 月

摘要

齊邦媛與楊靜遠兩位知識女性在抗戰時期就讀於重慶南開中學、國立武漢大學，雖然她們前半生有諸多交集但在戰後各自走向了不同的人生方向。齊邦媛《巨流河》、楊靜遠〈母親袁昌英〉展現兩位作者後半生迥異光景的同時，也描繪出兩位在權威敘事規範下陷入「失語」的母親：她們分別代表了傳統女性與知識女性的「失聲」。本文圍繞上述兩部作品所描寫的母女關係、母親形象展開討論，考察女性作家是如何在個人記憶的書寫中使母親的體驗、話語浮上歷史地表。首先，分析齊邦媛作品中描繪的知識女性與傳統女性間的紐帶；然後，對楊靜遠作品中兩代知識女性間的矛盾糾葛展開考察。這兩部作品展示了女兒透過書寫維繫、延續與母親間的紐帶的過程並藉此達成對父權制歷史、意識形態的抵抗。透過以上考察，不僅能看到齊邦媛與楊靜遠兩名後五四知識女性迥異的生命體驗，亦能讀取她們與母親的連結在文學上的表徵、母女文學上的影響關係。

關鍵詞：齊邦媛、母女關係、個人記憶、楊靜遠

Mother-Daughter Relationship in Female Intellectuals' Personal Memory Writing in the Post-May 4th Period: Analyzing Chi Pang-Yuan's *The Great Flowing River: A Memoir of China, From Manchuria to Taiwan* and Yang Jing-Yuan's "Muqin Yuan Chang-Ying"

Yue-Ting Gong*

Post-Doctoral Researcher, Graduate School of Humanities, Nagoya University

*Corresponding author: Yue-Ting Gong

Address: Nagoya University, Furo-Cho, Chikusa-Ku, Nagoya, Aichi 464-8601, Japan.

E-mail: gong_yueting@yahoo.co.jp

Received: December, 2023

Accepted: February, 2024

Abstract

Chi Pang-Yuan (1924-2024) and Yang Jing-Yuan (1923-2015) are two female intellectuals who both graduated from Chongqing Nankai Middle School and Wuhan University during the War of Resistance period. There are many intersection points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ir lives. However, they took different paths after 1949: Chi Pang-Yuan moved to Taiwan while Yang Jing-Yuan stayed in mainland China. Chi Pang-Yuan's *The Great Flowing River: A Memoir of China, from Manchuria to Taiwan* (2009) and Yang Jing-Yuan's "Muqin Yuan Chang-Ying" (2000) are works that not only depicted the latter half of the authors' lives but also portrayed two different mother images. These images represent the reticence of women within the metanarrative.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mother-daughter relationships and mother images in *The Great Flowing River: A Memoir of China, from Manchuria to Taiwan* and "Muqin Yuan Chang-Ying", discussing how daughters restore their mothers' voices through personal memory writing. In the first section, this paper attempts to analyze mother-daughter relationship in Chi Pang-Yuan's work. This work portrays a typical imag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woman and reveals the bond between the "new woman" and the "old woman". In the second section, this study focuses on "Muqin Yuan Chang-Ying", examines Yang Jing-Yuan's description of the bond between mother and daughter who are both considered as literati. Particularly,

the ambivalence in mother-daughter relationship revealed in Yang Jing-Yuan's writing is worth analyzing in depth. In these works, mothers' voices are silenced owing to the patriarchal history narrative or political campaigns, and daughters restore their mothers' voices and reconnect with them through writing as a means to resist patriarchal ideology. Based on above analysis, this paper aims to determine the different life experiences of female intellectuals and explore how the bonds between the mothers and the daughters influenced female literati's writing during the post-May 4th period.

Keywords: *Chi Pang-Yuan, mother-daughter relationship, personal memory, Yang Jing-Yuan*

壹、前言

齊邦媛(1924–2024)與楊靜遠(1923–2015)，如果按照許紀霖(2003)對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的分代，她們屬於「後五四」的第二批知識女性¹。1930、1940年代她們均畢業於重慶南開中學及武漢大學，後成為文學家、翻譯家。政治思想上齊邦媛站反共立場，楊靜遠則與之相反。

齊邦媛自1970年代起透過文學評論、英譯等方式致力於向世界推介臺灣文學，被稱為「臺灣文學的國際推手」(單德興，2016，頁167)，在臺灣文壇享有極高聲譽和地位。2009年，她出版《巨流河》(以下簡稱《巨》)，該作記錄20世紀來臺的外省移民世代的苦難與流離，不僅引來兩岸無數關注，還被譯為日語、英語介紹至海外。楊靜遠主要的身分是翻譯家，以兒童文學翻譯《彼得·潘》、《柳林風聲》最為著名²，她被學界認為「對中國兒童文學翻譯具有典範性的意義」(徐德榮、王琳，2022，頁68)。除文學翻譯外，楊靜遠主要作品有：《寫給戀人：1945–1948》³(以下簡稱《寫給戀人》)、

《讓廬日記：1941–1945》⁴(以下簡稱《讓廬日記》)，以及散文、文論等。楊靜遠和齊邦媛的創作文類都以論述為主，但目前楊靜遠在學界得到的關注不及齊邦媛。齊邦媛與楊靜遠都出生在父輩的光環之下且一生受其影響，她們的生命體驗透過文學嵌入歷史光譜，反映出那一代知識女性的生存姿態。與楊靜遠之母袁昌英⁵(1894–1973)所代表的五四知識女性相比，齊邦媛與楊靜遠所代表的後五四第二批知識女性受到社會政治環境中意識形態等思想碰撞影響更深，她們的書寫和體驗與兩岸時代風雲變幻緊密相連。此外，和五四女作家以「女兒獨語」的方式描寫母女關係⁶不同，齊邦媛與楊靜遠對於母親的書寫折射出歷史巨輪下，母女背負的相似命運。

在這裏對齊邦媛、楊靜遠兩人1949年以前的經歷進行大致梳理。

齊邦媛出生於遼寧鐵嶺，名字源出《詩經》〈君子偕老〉中「子之清揚，揚且之顏也。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齊邦媛，2020，頁21)。母親裴毓貞是傳統婦女，1930年後跟隨丈夫漂泊流

¹ 許紀霖以1949年為中界，將整個20世紀中國的知識分子分為六代：晚清一代、五四一代、後五四一代、十七年一代、文革一代、後文革一代。其中後五四一代可分為兩批，1895至1910年出生的為前一批，1910至30年出生的為後一批。詳見許紀霖(2003，頁82–83)。本文使用的「後五四」一詞指齊邦媛、楊靜遠所代表的第二批。

² 《彼得·潘》原著為詹姆士·巴里(James Matthew Barrie) *Peter and Wendy* (1911年出版)，楊譯本出版於1991年；《柳林風聲》原著為肯尼斯·格雷厄姆(Kenneth Grahame) *The Wind in the Willows* (1908年出版)，楊譯本出版於2007年。

³ 初版於1999年出版，收錄楊靜遠1945年至1948年間寫給戀人的100多封書信。本文使用2015年北京商務印書館版本。

⁴ 初版於2003年出版，收選楊靜遠1941年7月至1945年8月的日記。本文使用2015年北京商務印書館版本。據作者說法，原始日記約50到60萬字，為避免冗長刪減至25萬字左右。詳見楊靜遠(2015a，頁8)。

⁵ 袁昌英，字蘭紫，湖南醴陵人。民國初期留學英、法。代表作有《孔雀東南飛及其他獨幕劇》(1930年出版)、《飲馬長城窟》(1947年出版)。

⁶ 謝冰心、馮沅君、蘇雪林等五四女作家的文學顯示了現代女性——女兒對傳統女性——母親的境遇的同情與觀照，確立了女性文學中母親形象以及母女關係的重要地位。但李玲指出，「『五四』女作家向慈母傾訴痛苦的創作表面上是對話，實際上往往是獨語」，展現出「女兒面對慈母愛心與封建父權聯盟時的束手無策」。參見李玲(1998，頁54–55)。

亡。父親齊世英（1899–1987）為東北政治菁英，1916年留學日本，後留學德國，1925年參與張作霖的部下郭松齡（1883–1925）的倒張起兵，最終郭松齡兵敗巨流河，齊世英流亡關外，加入國民黨。該戰役的悲劇收場，對後來東北乃至整個中國的命運產生了深遠影響，齊邦媛一家從此開始流亡生活⁷。齊邦媛的幼年在「無父」的世界中度過（齊邦媛，2020，頁21），直到1930年她隨母親前往南京投奔父親，「父親」這一角色才開始正式參與她的人生。跟隨父母的腳步，少女齊邦媛經過多地的輾轉來到四川。1938年她入讀重慶南開中學，1943年考入武漢大學⁸哲學系，一年後轉入外文系。1947年她來到臺北，來時本以為只是客居，不想臺灣卻成為後半生紮根之地。

與齊邦媛相比，楊靜遠的少女時代則安穩許多。母親袁昌英是著名女作家、學者，是第一個在英國獲得文學碩士学位的中國女性（陳建軍、戚慧，2023，頁16）。留英期間經父親介紹與楊端六（1885–1966）訂婚，1923年生下楊靜遠。1929年起任教武漢大學（以下簡稱武大）外文系，是武大聘請的第一批教授。在武大她與凌叔華（1900–1990）、蘇雪林（1897–1999）交往密切⁹，三人被稱為「珞珈三傑」。由於袁昌英更偏重學術研究，學界對她的文學創作的關注尚不及凌叔華和蘇雪林。袁昌英多被視為「半新半舊」、「折衷主義」的知識女性，她的文學在

思想狂飆的時代裡因強調理性精神而與時局格格不入（龔潤枝、昌切，2022，頁133–135），〈春雷之夜〉、〈玫君〉¹⁰等顯示出她所代表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群的理念和偏保守的婚戀觀。並且從她的人際交往、1948年被推舉為國大代表等經歷可知她在政治上偏向國民黨一方。楊端六早年留學日本，1930年後任教於武大。戰時他一度因無法推辭蔣介石的邀請而兼任國民黨審計廳廳長，但骨子裡始終是個書齋學者。楊靜遠的名字來自父親喜愛的座右銘「淡泊明志，寧靜致遠」（羅惜春，2015，頁32）¹¹。1941年楊靜遠從重慶南開中學畢業，同年考入武大外文系。由於父母都是武大元老級教授，楊靜遠在校內總是受到矚目和羨慕的存在。1944年，她申請美國密歇根大學（University of Michigan）的「巴伯氏獎學金」（Barbour Scholarship），父母透過周鯁生（1889–1971）幫忙請胡適（1891–1962）寫推薦信，最終順利通過審核（楊靜遠，2015b，頁2）。翌年，楊靜遠進入密大英國文學專業，1948年，雖然父母望其繼續深造，但她毅然決定回國。1949年8月，她進入華北人民革命大學，建國初期先後任職於中央編譯局、人民出版社。

從經歷上看，齊邦媛與楊靜遠二人的交集點十分明顯：就讀於同所中學和大學，受教於孟志蓀（1901–1978）、朱光潛（1897–1986）、吳宓（1894–1978）、

⁷ 關於該事件記述詳見沈雲龍等人（1990，頁1–64）。

⁸ 1938年春，武漢大學遷校入川，新校址在四川樂山。抗戰勝利後分批復員。

⁹ 凌叔華，生於北京。新月派代表作家。代表作有〈酒後〉（1925年出版）、〈花之寺〉（1928年出版）。1928年隨丈夫陳源進入武大。蘇雪林，原籍安徽太平。1921年留法，1931年經袁昌英推薦任教武大，1952年來臺。代表作有《綠天》（1928年出版）、《棘心》（1929年出版）。

¹⁰ 1935年〈春雷之夜〉刊載於《文藝月刊》7卷1期；1925年〈玫君〉刊載於《小說月報》16卷3期。

¹¹ 轉引自劉星、王明亮（2022，頁125）。

袁昌英等名家。《讓廬日記》中有四處提及齊邦媛：1943年10月7日「余逸憲告訴我，齊邦媛來了。可不是，在南開同過寢室的。我很高興，馬上同余到飯廳樓去看她。（略）她考取哲學系，她說孟〔志蓀〕先生勸她來找我」（楊靜遠，2015a，頁172-173）；1944年3月6日「晚上到齊邦媛房裡坐了半晌，取回《民族文學》。她很坦白地告訴我她不喜歡這裡，簡直過不慣。（略）她想轉學」（楊靜遠，2015a，頁219）；1945年1月2日「晚上在家中過年，十個人圍著方桌坐，（略）齊邦媛，連家裡四人」（楊靜遠，2015a，頁329）；1945年7月5日「安姐和齊邦媛明天去重慶。今晚請他們吃飯」（楊靜遠，2015a，頁387）。由以上可知她們學生時代雖算不上交情深厚，但亦不止於泛泛之交。此外，《巨》中也提到1999年齊邦媛參加武大校友聚會後去北京看望楊靜遠（齊邦媛，2020，頁573-575）。在戰火紛飛的動盪時代齊邦媛與楊靜遠都是幸運的，作為女性她們接受了完整且足以代表當時中國最高文化水平的教育。但她們最終走上相左的人生道路：原本在母親影響下懷揣作家夢的楊靜遠大學期間思想左傾，與父母的關係出現巨大裂痕；而齊邦媛始終與政治活動保持距離，對左翼思想持排斥態度，《巨》中她面對中共的統治發出詰問，當寫到楊靜遠的「左轉」時她顯露出「不置可否」的態度。唐媿嘉（2019，頁64）在論述《巨》時提及《讓廬日記》：「通過對《巨流河》與《讓廬日記》的對讀與爬梳，也

從側面昭示了時代情緒下青年知識分子不同的道路選擇與人生趨向」。但在現階段找到的學界研究成果裡尚未看到以齊邦媛與楊靜遠兩人為中心的論述。

毫無疑問，1949年是齊邦媛與楊靜遠人生中最重要分界點之一，那之後一灣海峽的距離決定她們人生的相反走向。齊邦媛在臺灣展開新的人生篇章，《巨》中她以一個來自東北的知識女性的視角見證20世紀後半葉臺灣的變遷及臺灣文學的發展，在回顧兩岸歷史的同時她也完成了一個知識女性的自我歷史的建構。在海峽對岸的楊靜遠則無可避免地遭遇文化大革命等政治風暴，文革中母親的去世更是給她的後半生留下永不癒合的傷口。1969年，她被下放到湖北咸寧的五七幹校¹²，那時唯一能給她心靈帶來慰藉的讀物只有留學期間與戀人來往的書信，翻讀過去的自己寫下的文字時，「那況味，猶如透過時光的微孔，偷窺一幅幅光怪陸離的西洋景——裡面的世界，是那麼遙遠而陌生」（楊靜遠，2015b，頁2），她如此回憶。1989年，她將3年半的幹校時光寫成回憶錄，1993年在蘇雪林等人幫助下由臺北海風出版社出版《鍊人學校》，署名苑青（李城外，2008，頁32）。2000年，該書更名《咸寧幹校一千天》，作為20世紀「歷史備忘書系」之一由長江文藝出版社出版。應主編李輝的請求，她在書末尾加寫了五篇文革回憶文章，其中最長的一篇是〈母親袁昌英〉（以下簡稱〈母親〉），約三萬字。該文以真切細膩的情感和筆觸刻畫了女兒眼中的袁昌英。

¹² 文革時期，為貫徹毛澤東〈五七指示〉精神，中共中央自1968年起在全國各地建立農場，用來對知識分子進行勞動及思想改造。對「右派」而言，在幹校生活享有一定的人身自由，相比其他環境是一種解脫。上述說明參見「五七幹校」（2022）。楊靜遠所在的幹校位於咸寧向陽湖地區，自1969年起至1974年結束。參見楊靜遠（2000，頁5）。

關於《巨》，此前已有諸多研究者從敘述視點、性別研究、歷史書寫等角度進行考察。張學昕與梁海（2013）圍繞該作品的「非虛構」視角展開論述，指出作者完全拋棄「紀實文學」中的意識形態色彩，以真實感和現場感作為首要的敘事策略，引領讀者進入她的人生與歷史現場。戚慧則進一步說明該作品中敘述視點與聲音的分離狀態，「視點是當時的齊邦媛，而陳述者則是故事發生若干年後的齊邦媛」（戚慧，2021，頁 99），由此《巨》的敘述得以脫離時空限制。李孟舜分析了齊邦媛自傳書寫中的性別主體建構問題，關於作品中描寫的以母親為首的女性群像，李孟舜指出，「當社會文化環境對『賢妻良母』的女性角色仍存在根深蒂固的期待時，女性群體之間的守望相助更顯得彌足珍貴」（李孟舜，2019，頁 31）。袁玲麗（2018）、唐媿嘉（2019）則圍繞作品中的女性成長主題進行了討論。

《巨》既是齊邦媛的自敘傳，也是她對父親的追憶，用王德威的話來說，「它是一場女兒與父親跨越生命巨流的對話」（王德威，2012，頁 161）。相比父親，母親所占的篇幅則顯得過於稀少，齊母這一人物常被論者忽視，李建立提到：

因為這無法左右自己命運的女性，似乎和大時代沒有直接關係。她除了在一生中不斷隨夫飄零外，似乎留給讀者的印象就是給流亡中的人們做出了一餐餐溫熱的飯菜。這是這位柔弱的女性參與大時代唯一可能的方式。既不能影響大事件的走向，也不可能出現在歷史的宏大敘述中。（李建立，2012，頁 168）

唐媿嘉在論述中指出齊母在作品中的重要性，分析了作者寄託在母親這一人物身上的「流亡」意味，「齊母作為『流亡』者附屬物一般的存在，卻真正詮釋和踐行了『流亡』的一生」，她代表著那個時代「隱性的靜默的『流亡者』」（唐媿嘉，2019，頁 68）。筆者認為，對於作品中的母親還有很大的探討空間，尤其值得從女兒的文學啟蒙這一切入點出發，對宏大歷史敘事中的母女連結進行考察。袁玲麗（2018）論述雖提及母親對女兒的文學啟蒙，但僅列舉出相關描寫，未對母親之於女兒的文學啟蒙的性質或意義、母女生命體驗的共通性等問題進行深入探討。

另一方面，楊靜遠的文章在學界通常被作為歷史紀錄材料來論述或引用，無論是她的書信、日記還是回憶文，其史料性、紀實性完全蓋過文學性。同樣，〈母親〉多見於各類評論或是關於袁昌英的研究中，尚未見到以它為中心的論述。然而除了史料價值，我們不應忘記該作品是出自一個女兒視角的對母親的追憶，並非客觀的「紀實文學」。從這一點來看，這篇文章與史詩風格的《巨》相差無幾，只不過後者中女兒追憶的主要對象是父親。也就是說，〈母親〉值得從文學研究的角度加以關注。相對於《巨》描寫的靜默的母親，〈母親〉展現的是一個知識女性在思想啟蒙運動中自我覺醒，卻在文革中再度陷入失語的過程，而透過承繼給女兒的文學她的聲音及曲折的生命歷程得以重見天日。

除女兒視角這一共通點外，從敘述方式上看，《巨》、〈母親〉均採用碎片式敘事。楊靜遠同齊邦媛一樣，敘述中不抱有任何解構或下判斷的衝動。雖然楊的文章中能看到意識形態環境對個人表達的制約，但她仍然使文本停留在個人記憶層

面，即使無法完全脫離權威的評判尺度，卻有意識地與它保持著距離。張學昕與梁海曾用「作者在時間之上拼接記憶的碎片」（張學昕、梁海，2013，頁27），然後「以文學的形式再現」（張學昕、梁海，2013，頁26）這樣的說法來論述《巨》，筆者認為以上說法同樣適用於〈母親〉。在文章開頭楊靜遠寫道：

很難說我所理解和表達的母親，是完整真實準確的袁昌英。我只能夠依從時斷時續時有時無的記憶的牽引，（略）想到什麼寫什麼。力求在茫茫迷霧中捕捉那隻閃爍飛翔的蛾子——歷史的和我個人情緒的真實。（楊靜遠，2000，頁186）

楊靜遠在無序的時空和雜亂的記憶碎片中穿梭，她無意從客觀角度展示「真實」，而是以內在視點描摹母親的印象。

關於記憶、真實與歷史三者間的關係，繆作林在考察《巨》時作如下論述：

由於個體回憶的不確定性以及歷史的全貌向來隱蔽的特性，從而在細節上保留了巨大的想像和闡釋空間，作者也得以用文學語言和主體的審美想像去「構建」回憶中的「歷史」。（繆作林，2021，頁22）

《巨》、〈母親〉可以說是透過作者的個體記憶與文學語言的結合完成對歷史的重構，從而達成與權威歷史敘述的對抗。另外，這兩部作品在父、母的著墨比例上呈現出完全的對比：《巨》追憶的中心為父親，〈母親〉追憶的中心則為母親。但不可忽視的是兩部作品中母親之於女兒的文學及人生影響，或者說，母女紐

帶與文學有密切的關係。並且，兩位母親的遭遇分別代表了傳統女性、知識女性的失聲。

本文圍繞《巨》、〈母親〉中的母親形象及母女關係展開分析，考察女性作家是如何在個人記憶書寫中展示母親的生命體驗、話語。本文考察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論述《巨》中作為傳統女性的母親是如何透過女兒的文學參與大時代敘述；第二部分注目於〈母親〉，論述在政治劫難中陷入啞啞的母親是如何在女兒的書寫中取回聲音。另外，在說明50年代楊靜遠與母親間的關係時，也將提及《讓廬日記》和《寫給戀人》。筆者認為，《巨》、〈母親〉分別展現了在戰爭陰霾、意識形態強勢介入之下女兒透過書寫維繫並延續與母親間的紐帶的過程，或者可以說文學成為母女間的連結以及母親獲得「聲音」的場域。本文期盼透過以上考察更明晰地展示後五四知識女性的生命軌跡，母女間的紐帶及文學上的承繼關係，達成與前行研究的對話。

貳、《巨流河》：傳統女性與現代女性間的母女紐帶

從地點上看，《巨》的敘事從東北遼寧的遼河開始，到臺灣南端的啞口海結束，這一路線是齊邦媛與她的父母所代表的兩代人人生足跡的縮影。齊邦媛用細膩樸實的文字將讀者自然地帶入她的記憶之中，跟她一起成為歷史的見證者，同時讀者也見證她個人的歷史。在第一章的引子，她描寫東北的廣袤蒼茫景象之後，第一個出現的聲音是母親的歌聲。正如該章標題「歌聲中的故鄉」，作者在母親的歌聲之中拉開幼年記憶的帷幕。

引子中關於母親的描寫如下：

我出生在多難的年代，（略）幼年聽母親幽怨地唱〈蘇武牧羊〉，二十年後（略）的臺中，她竟然在我兒子搖籃旁唱：「……蘇武牧羊北海邊……」。我說：「媽，你不可以唱點別的？」她有時就唱〈孟姜女〉。她說自從十九歲嫁到齊家，（略）不能還鄉。（齊邦媛，2020，頁19）

這裡作者以轉述形式描寫母親的話語，母親沒有主體性的語言，她只有滿載著鄉愁的歌聲，從東北一直延續到臺灣。如果說父親的聲音引導女兒的精神和理想，進而成為作品潛文本，那麼母親的聲音則是透過歌唱的形式進入文本、融入女兒的記憶河流，從女兒的生命之初到她亦為人母。母親在外孫搖籃邊唱歌的畫面既象徵著「流亡」和「鄉愁」，還暗示著母女間共通的身體經驗。

整部作品鮮少從正面角度展現母親的話語，母親是一個悲苦、忍辱負重的傳統婦女形象。第一章裡，齊邦媛以俯視角度還原出母親默劇般的生活情景以及與父親形成鮮明對比的人生軌跡。母親十九歲嫁到齊家，「十年間沒有離開過那座莊院有形和無形的門」，在女兒的記憶中，「在家鄉的母親，不是垂手站在桌邊伺候祖父母吃飯，就是在牧草中哭著」（齊邦媛，2020，頁28）。她的名字可以被丈夫隨意更改，丈夫「在廣大的世界，縱情於書籍、思想，參與青年人的社會、活動」的時候，妻子「留在家鄉，莊院屋子裡是忙不完的家務；（略）洗不盡的鍋、碗，掃不完的塞外風沙」（齊邦媛，2020，頁29），在日復一日的孤獨等待中消耗自己的人生。母親喪子後只能躲起來釋放悲傷，因為年輕媳婦哭泣被認為是「不祥」的。

她只有趁黃昏伺候了晚飯後，在夕陽餘光中躲到牧草叢中哭泣。後院空地上長滿了一人高的牧草，從春天雪融時的嫩綠到降雪時的蒼茫，庇護著她壓抑的哭聲。她還帶著我去一里路外的祖墳，仆倒在我弟弟那小小的新墳上痛哭。我記得祖墳四周種了松樹，在初春的風中猛烈地搖撼，沿著老墳周圍則開滿了粉紅色的花，（略）祖母說是芍藥花。（齊邦媛，2020，頁29-30）

夕陽、牧草、墳墓、芍藥花等景物在母親哀切的哭聲裡構成一幅淒美蒼涼的畫面，被舊傳統壓迫的女性伏在生與死的邊界發出悲鳴。女兒在這裡成為母親的痛苦宣洩的唯一見證者，看似脆弱但帶具有高貴的美感的芍藥花成為她一生中永不凋謝的美與悲傷的意象，象徵舊時代女性的痛苦。

女兒從母親身上不僅體會到傳統女性的悲慘命運，還繼承了女性對生命、自然、情感的纖細感覺。由於幼子的死亡，母親陷入精神恍惚的狀態，家人終於決定把她和兒女送到遠方的丈夫身邊。齊邦媛這樣描寫母親初次離鄉時的情景：「馬車出了村口不久，路旁就是一排排禿山，亂石嶙峋，一棵樹也不長」，被女兒問到山名時母親答：「這叫『鬼哭狼嚎山』」（齊邦媛，2020，頁31）。這個山名正好呼應此時母親的心境：

她去投奔一個已離家多年的丈夫，牽著兩個稚齡兒女，走向數千里外一個全然無法想像的大城；（略）心中的惶惑、畏懼，豈不正如進入鬼哭狼嚎的世界？（齊邦媛，2020，頁31）

這段描繪中女兒對故鄉外的世界充滿新奇的視線與母親惶恐畏懼的心境既形成對比又互相重疊，蒼茫陰暗的自然景象成為母親的悲傷憂鬱的象徵。母親講述的關於自然的故事成為女兒的文學啟蒙：

我一生對文學的熱愛和觀念，其實是得自我那沒有受過中學以上教育的母親，（略）她的鄉野故事有些是溫柔的盼望和悲傷，有些充滿了人心的悸動。如同鬼哭狼嚎山，毫無修飾、強烈地象徵著她那時對南方大城的畏懼，和對自己命運的憂慮。（齊邦媛，2020，頁31）

對於女兒來說，母親的「故事中的朔風寒夜，虎狼出沒的威脅，春夏牧草重生的歡樂，激發了我一生的想像」（齊邦媛，2020，頁537-538）。

文化程度不高的母親在父權制文明中沒有被賦予表達的權利。她的悲哀、痛苦與自然、歌聲相連，引起女兒對女性命運的情感共鳴，激發其文學想像，這樣具有原始性、身體性的母女間的共感不受文明或制度的壓制，例如上一段的引用中能明顯看到女兒對母親情緒的共感。Cixous（1975/1995，頁196）曾指出，在父系社會文明中以母女關係為代表的女性間的自然連結「是一種無法被切斷卻能擊敗清規戒律的力量」，「它使你〔女性〕胸中充滿了用語言表達的衝動」。也許正因為與母親間的共感，齊邦媛的文學裡充滿了對自然景物、人類原始情感的敏感感覺，既有對女性集體命運的關注也有對個體女性的關懷。母親的體驗與她所講的「鄉野故事」一樣，不屬於大時代的、父權文明的敘述，但卻成為女兒文學的基石，透過

女兒的記憶與文學得到繼承和流傳。如李建立所述：

裴毓貞何嘗不是處在大時代的「啞口海」中，（略）好在有齊邦媛的如椽妙筆，裴毓貞的故事讀來字字溫情，齊邦媛（略）對「疼痛」的敏感和與文學天然關聯的認識，大概也是從她母親那裡開始的吧。（李建立，2012，頁168）

唐媿嘉（2019，頁68）認為，作品中齊母是父親的「附屬物」一般的存在，她缺少主體性，與其說是「母親」，不如說是一個為流亡者們提供「母愛」的溫暖的符號。但母親並不只是「符號」。不論是在故鄉的傳統大家庭還是在跟隨丈夫數十年的漂泊中，雖然母親始終在傳統規範內踐行女性的「美德」，甚至可以說，女兒刻意採取這樣的方式來描寫母親——將她置於無聲的「溫情符號」的位置上，但靜默的母親始終占據著作品中一個不可動搖的位置，由此成為一道不被大時代掩蓋的河流。

在屈指可數的對母親話語的正面描寫中有一個場景值得特別注意。第一章裡作者回顧一家人跟隨父親在顛沛流離中度過的歲月，然後時間轉到幾十年後的臺灣，女兒和母親談及新時代女性婚姻選擇權的問題。母親被女兒問到現在是否仍會選擇嫁給爸爸時，她沒有立刻回答，過了幾天，她說：「我還是會嫁給他。他雖不是『家庭第一』的男人，但他是溫和潔淨的真君子」（齊邦媛，2020，頁54）。誠然，此處作者的主要意圖並非表現舊時代女性複雜的內心世界，而是為了從側面強調艱苦歲月中父母患難與共的羈絆。但是，母

親短暫的沈默是她的主體性的體現，也可以視為舊時代女性無法訴諸言語的內心世界的象徵，如果沒有女兒的文字，這沈默只會是男性主宰的大歷史裡一次稍縱即逝的吐息。

最後一章裡母親走到了生命盡頭，晚年的她向宗教尋求精神慰藉，齊邦媛這樣描繪她的樣子：

她把我結婚的禮物，一本大字《聖經》（略）捧讀萬遍，紅筆勾劃背誦經文。（略）也許這是她（略）為丈夫子女活了一輩子之外，唯一屬於自己的心靈天地。（齊邦媛，2020，頁 537）

作品的開端和結尾，母親都沒有作為個體的語言，她的話語被象徵鄉愁的〈蘇武牧羊〉及代表宗教皈依的《聖經》所替代。

另一方面，齊邦媛雖然走上了與母親那一代女性截然不同的道路，在社會上實現了個人價值，但傳統性別規範已被她內化，她面對父權文明設下的一道道難以突破的屏障時體會到千百年來女性所受到的共同的壓抑。她中年時赴美國印第安納大學（Indiana University）留學，在獲得前所未有的充實感的同時，「每一日都是從妻職母職中偷身得來」（齊邦媛，2020，頁 379）的負罪感無法消散。甚至，因為父親一紙召喚她回家輔佐丈夫的家書，她不得不放棄唾手可得的碩士學位，留下多

年的惆悵（齊邦媛，2020，頁 383）。不論是現代女性還是傳統女性，父權社會中她們面臨的困境和命運如此相似，這也是在齊邦媛關於母親的描寫中總能看見有女性間的共感的原因吧。

齊母裴毓貞的個體話語雖被隔絕於男性中心主義的宏大敘事¹³之外，但《巨》中女性共通的生命體驗以及對女兒的原始性的文學啟蒙，成為這個傳統女性參與大時代敘述的另一種方式，齊母的無聲恰恰成為她的「聲音」。周慧珠（2009）將為文學奉獻一生的齊邦媛比作「巨流河中一滴永不乾涸的水」，而當女兒齊邦媛從個體視角出發以文學形式架構歷史，名為裴毓貞的女性亦成為歷史河流中一滴永不乾涸的水。

參、〈母親袁昌英〉：女性知識分子間的母女紐帶

相較《巨》中表現的現代女性與傳統女性間的連結，〈母親〉所展示的是兩代知識女性間的羈絆和糾葛。作為女作家，袁昌英是中國現代史上最早為自己及女性群體發出聲音的女性之一¹⁴；作為母親，她是對楊靜遠的人生影響最深的人。在進入〈母親〉的文本分析之前，有必要爬梳 1940 年代至文革前楊靜遠與袁昌英之間的關係變化軌跡。

一、意識形態影響下的母女關係裂變

如果說齊邦媛的人生裡影響她最深

¹³ 近代以前，「此類宏大的敘述只容納偉大的男人的事業，諸如解放、民主革命以及民族——國家等問題」，在民族主義話語支配的晚清小說中，女性「僅僅是生育的機器，（略）她們的主體性和自我空間（略）被嚴重忽略」。參見劉劍梅（2003/2014，頁 31）。

¹⁴ 五四時期袁昌英發表多篇文章呼籲女子權利，例如：1920 年〈論女子留學的必要〉刊載於《太平洋》2 卷 8 期；1923 年〈中國婦女參政運動之前途〉刊載於《婦女雜誌》9 卷 1 期。

的是以父親為首的男性¹⁵，那麼楊靜遠的人生則正相反，尤其少女時期，她可以說是在以母親為首的五四女作家們的薰陶下成長。袁昌英、凌叔華、蘇雪林，三人間的情誼不僅被她們自己的文學所記錄，楊靜遠亦是與她們距離最近的見證者之一。40年代，袁昌英一家在樂山縣陝西街「讓廬」與蘇雪林一家比鄰而居，街盡頭的萬佛寺山崗上住著楊靜遠的乾媽凌叔華及其女兒，楊靜遠晚年寫下了許多關於三位女作家的回憶文¹⁶。三位女作家浪漫婉約的寫作風格也對楊早期的文學創作產生了不小的影響¹⁷。

楊靜遠多次提到母親之於自己人生的意義，在《讓廬日記》中她這樣寫道：

母親之於我，遠遠超越一般的母女關係。她不僅是至愛至親者，還是諄諄善誘的師長，人生道路的啟蒙者，是我心儀文學的領路人。從她那裡我繼承了文藝的基因。她（略）助我編織起絢爛的寫作夢。在她的鼓勵下（略）我心中燃起了狂熱的創作慾望。（楊靜遠，2015a，頁5）

相比近乎隱身的父親，母親的身影貫

穿全書。楊靜遠被母親領入文學世界，她沈醉於詩意浪漫的文藝作品，在母親指導下創作的小說〈縈〉充滿浪漫唯美色彩。可以說，母親是女兒文學道路上的第一導師。不僅如此，女兒透過抄寫、翻譯等輔助形式亦參與到母親的文學活動之中¹⁸。

此外，從日記中可以看出大學前期的楊靜遠與母親親密無間，她們時常共枕夜聊，談論人生、文學，並分享女性情感上的私密。楊靜遠常常流露對母親濃濃的依戀之情，甚至當她受到共產主義思想吸引，立場開始發生轉變時，母親的愛是唯一能牽絆她的力量¹⁹。在楊靜遠眼中，半新半舊的婚姻之於母親雖不是全然的幸，但仍是無法彌補的缺憾：

經濟學家楊端六是個理性的務實的缺少藝術氣質的人，他不懂浪漫，缺乏詩意。由於年長許多，（略）他無法深入她的內心世界，不能滿足她對兩性情愛的至高期冀，（略）母親，對生活充滿熱望和渴求，從嚴肅拘板的父親那裡是很難得到回應的。（楊靜遠，2000，頁190）

相較母親，父親對於女兒人生的影響

¹⁵ 王德威指出，在《巨流河》的眾多人物裡，有四位男性最足以決定齊邦媛的態度，分別是：齊世英、張大飛（抗日英雄、初戀）、朱光潛（文學與美學導師）、錢穆（國學大師、忘年交）。參見王德威（2012，頁161）。

¹⁶ 例如：1997年楊靜遠發表〈讓廬舊事——記女作家袁昌英、蘇雪林、凌叔華（上）〉、楊靜遠〈讓廬舊事——記女作家袁昌英、蘇雪林、凌叔華（下）〉兩篇文章，分別刊載於《新文學史料》3期、4期。關於樂山武大時期「瑤珈三傑」的生活狀況、居住環境等參閱張在軍（2017）。

¹⁷ 楊靜遠早期文學的代表作品短篇小說〈縈〉講述了一個淒美的愛情故事，頗受袁昌英欣賞。小說全文參見楊靜遠（1943）。1944年楊創作〈靜水〉（刊登情況不明），描寫城鄉脫節，該小說體現其思想轉向社會革命。

¹⁸ 例如：1944年1月，楊靜遠（2015a，頁203）幫忙趕抄袁昌英《法國文學》，同年8月該書由商務印書館出版。

¹⁹ 楊靜遠（2015a，頁240）在1944年4月30日的日記裡記錄下與左派文藝人士的談話，她如此敘述自己的心境：「我覺得我正面對一堵牆，牆上一個洞，（略）有人在那邊從洞口招我過去。（略）要是我閉上眼邁過去，我將（略）失去我最可貴的溫情（略）。不可能，任何鐵石的理性不能消除我對媽媽的愛，即使我自己發現從歷史的觀點看，牆外的世界應該應時而起代替牆裡的世界」。

顯得稀薄許多，母親在家庭中通常扮演女兒第一位的理解者或幫助者角色。所以，楊靜遠的日記裡母親是整個家庭的核心，和父親之間的隔閡使母女紐帶更加牢固。

然而左翼思潮的吸引力最終使楊靜遠偏離文學之路，母女關係也隨之產生裂痕²⁰。留學前隱瞞與左傾男友的戀情亦是引起母女關係危機的原因之一，「一生中這樣的大事，不得不瞞過父母，特別是至愛的母親，使我在今後幾年陷入難以解脫的痛苦」（楊靜遠，2015b，頁6），她如此追憶當時的心境。《寫給戀人》中能看到楊靜遠思想轉向後，和母親的分歧成為引起她精神痛苦與動搖的根源。她帶著與母親、家庭背道而馳的負罪感，同戀人一起奔向共產主義陣營。50年代前期，楊端六和袁昌英的思想起了一定程度的轉變，楊靜遠與父母的關係開始好轉，與母親之間的裂痕隨著外孫女的誕生漸漸癒合。1954年袁昌英加入中國作家協會，1956年當選為湖北省政協委員（陳建軍、戚慧，2023，頁326-328），那「是她後半生僅有的一段陽光燦爛的日子」（楊靜遠，2000，頁192）。

但好景不長，1957年袁昌英被劃為「極右」，以「反革命罪」被判處管制2年，1970年被逐出武大，楊靜遠設法將她送到湖南老家與遠親同住。1973年4月28日袁昌英病逝於湖南。1979年10月，袁昌英得到正式平反。如果說50年代前半期是楊靜遠與母親得來不易的裂痕療癒期，那麼1957年便是建國後母女命

運的分水嶺，之後母親便被劃入女兒記憶的禁區。直到千禧年初始，女兒再次提筆，打開記憶的閘門，母親、作家袁昌英才得以再次浮上歷史的水面。

二、〈母親袁昌英〉中的母親與女兒

在〈母親〉的開頭楊靜遠即表明，這次關於母親的書寫是一次打開個人記憶封印的行為。對於作為女兒的她而言，1957年後與母親相關的回憶早已成為「一隻深深扎入心房的利箭，（略）一處永不癒合的傷口，永遠露著粉紅的嫩肉，滲著血絲和淋巴液」（楊靜遠，2000，頁185）。她在傾瀉而出的記憶碎片裡浮到時間、敘述規範及意識形態之上，嘗試完全憑借感覺拼湊、還原母親的肖像與聲音。

如前言所述，楊靜遠與齊邦媛一樣採用碎片式的寫作方式，只不過相比後者敘述有時間粗線，前者敘述顯得更加「意識流」，就如楊靜遠（2000，頁186）所說，「順著凌亂無序前後跳動的思路，想到什麼寫什麼」。透過爬梳楊靜遠的敘述順序，能看到大致線條如下：文革前父親病逝 → 1920年代父母結合、女兒出生 → 父母定居上海 → 母親初期文學創作 → 父親與母親關係 → 建國初期家庭情況 → 母親被劃為「極右」 → 文革中弟弟與父母決裂 → 文革時期母親的生活 → 母親離開武大 → 30年代母親的珞珈武大時期 → 母親晚年在故鄉的生活 → 40年代樂山武大時期 → 1972年最後一次探望母親 →

²⁰ 楊靜遠（2015b，頁1）回憶自己思想轉向共產主義過程時作如下敘述：「假如生活中沒有大的波瀾，我或許會沿著母親的那條學者兼作家的路逕直走下去。但（略）幾件不尋常的事（略）使得這條老路難以為繼。其一，我開始接觸革命思想；其二，我得到了留學美國的機遇；其三，我墜入了情網。這幾件（略）事（略）陷我於無窮的困擾迷亂之中」。首次引楊靜遠（2015b，頁1-6）面對革命思想的人是左翼戲劇家冼群，其次為同學胡鐘達、男友顧耕（化名）。

母親病逝。這樣的線條乍看之下，敘述者彷彿將自己隨意放入記憶河流裡的某一處，然後開始漫無目的的漂流。如果將齊的敘事策略概括為，透過不斷地回放和倒帶，使讀者與她一同「穿越」回歷史現場（張學昕、梁海，2013，頁27），那麼楊的敘事更像是在時間、歷史片段之上跳躍，以1957年為分界，在母親過去的意氣風發與後來的悲慘生活景象之間往返，政治風暴下知識分子的慘狀展露無遺。

楊靜遠在零碎的片段中極力還原現場情景，描繪出一個學識淵博、充滿熱情的女作家在意識形態壓迫下被剝奪話語、尊嚴，生命一步步走向消亡的過程。當母親被逐出武大，回到既是初始亦是終結之地的故鄉，敘述者用冷靜沈重的筆調回顧母親一生的軌跡：

一片葉子，忽忽悠悠從樹梢落下，身不由己地飄到了她根部的地面——醴陵城西一處名叫轉步鄉楓樹塘駱家坳村落鳳山的僻靜山村。彷彿冥冥中早有定數：珞珈山——駱家坳。一個是山，高高聳立，出人頭地，風光無限；一個是坳，低凹、封閉、與世隔絕。諧音的兩個地名，準確地描出了她大起大落的命運軌跡的走向。而荒涼闕寂的落鳳坡，便是這隻曾展翅翱翔於文苑的鳳凰最後折翼墜地之處。（楊靜遠，2000，頁198）

閉塞的山村、沈默地從高山步入低谷的年邁婦人、落鳳坡，這些透著蒼涼氣息的描寫表現出一代才女凋零的淒清以及命運的殘酷。在楊靜遠筆下，文革中的母親是悲慘的、沈默的，但又是純粹天真的。

她是被命運強行帶入一個陌生世界的受害者，是在黑暗中依舊充滿文學熱情的老婦。當楊看見在鄉下的母親還懷抱著文學夢，為了讓她認清現實而給她潑了冷水，這裡並沒有正面描寫母親的反應，只是用抽象且和緩的敘述表現敘述者的情感色彩：

好在母親根本聽不進我的『忠告』，她一直做著夢，直到最後閉上那雙原本非常美麗卻因流淚過多而枯澀的眼睛，離開這個她無法瞭解的世界。（楊靜遠，2000，頁214）

寥寥幾筆勾勒出被「新世界」的法則逼至死亡的知識分子，以及不僅被時代所傷還被女兒刺痛的母親的模樣。

在楊靜遠的敘述中，除了對母親的懷戀，更帶著深深的自責與懺悔。她在幹校以勞動麻木自己的心靈：

在日復一日緊張的勞動和運動中，母親那祥林嫂一般傴僂的身影（略）被擠到一邊，沖淡了。（略）心，彷彿被磨得長出了一層厚繭，（略）不這樣，人就活不下去。（楊靜遠，2000，頁216）

另一邊，母親卻在風暴中孤獨地走向死亡。女兒不僅無法從黑暗中拯救母親，甚至在不知不覺中也成為將母親推向死亡邊緣的一員，對此她只能藉瘋狂的自責來達成與母親痛苦的同化：「我只知道（略）用我自己的悲觀絕望，（略）掐滅她尚存的一線希望之光。多麼愚蠢，多麼殘忍！為了這，我終生不能原諒自己」（楊靜遠，2000，頁228）。撕心裂肺的情感宣洩中

展現地不僅僅是母親的悲慘，更是母女二人苦痛的交疊。

楊靜遠站在主觀的全知視角拼湊母親的人生，一面零零散散地追溯母親的文學軌跡，一面描繪既是母親又是愛國女作家的袁昌英形象，從強調愛國情懷這一點能看出作者試圖在主流評判尺度之內恢復母親的文壇地位。在家庭中，母親手把手地教女兒寫作，希望她踏入文學殿堂：「她（略）鼓勵我練習翻譯、寫作，替我看稿子，聯繫發表的地方。她勸我多寫，多發表，以便成熟到一定程度在文壇上站住腳」（楊靜遠，2000，頁226）。然而女兒最終與母親背道而馳。

拾起母親人生碎片的同時，楊靜遠也完成了與母親的跨時空對話，並透過文學將紅色風暴中一個女作家的聲音永遠留存。她這樣描寫在故鄉時的母親：

那個漫山遍野瘋跑的小女孩，已經成了一個孤零零的風燭殘年的老婆婆，拄著杖在山間田徑上踽踽獨行，嗚咽的山風，撩拂著她的絲絲白髮。「我是在坐『山牢』。」她環顧四周，半是自言自語，半是對我說。「我是在坐山牢」，「坐山牢」，「坐山牢」……我彷彿聽到空谷飄來一串回聲。（楊靜遠，2000，頁215）

母親幽幽的聲音象徵著文革中被打壓到最底層的知識分子的絕望。女兒投身革命陣營結果反受其害，面對母親的遭遇，她雖然「試圖用革命道理說服自己」（楊靜遠，2000，頁229），但最終沒有成功，因為她明白母親要的是什麼。「山牢」一詞在文中出現數次，每當母親向女兒表

達希望離開山坳與她相聚的強烈願望，女兒被深深的無力感包圍時，母親陰悽絕望的聲音就會在耳邊回旋。「山牢」既是令母親痛苦的根源，也象徵著女兒心靈的牢籠。當母女的命運軌跡在政治風暴中重合，女兒所描寫的母親內心的吶喊——亦是女兒心靈深處的呼救：

一個（略）離不開精神生活、思想交流的人，被鐵窗般的群山阻隔，剝奪了這一切，只給她留下一副沒有意義的枯槁的軀殼，她（略）怎能不從靈魂深處發出淒厲的呼救！（楊靜遠，2000，頁228）

值得注意的是，雖然意識形態的介入導致楊靜遠與母親的關係出現裂痕，但她的書寫依然保有來自母親影響的痕跡，具體來說，那是一種女性間天然的情緒共感式的書寫習慣。在上引「山牢」的敘述中，有關母親的回聲的描寫可視為母女間共通的身體感覺的隱喻。再例如，她描寫母親悲傷地唱李煜〈浪淘沙〉：

也許是那位亡國君主痛失國土的哀傷特別觸動了她，她唱得最多的是這一首。這歌我聽得那樣熟，以致六十多年後那曲調還深深嵌在記憶中。是誰譜的曲，我不知道，（略）可那確乎是我聽過的古曲中最美的一首。（楊靜遠，2000，頁205）

接著楊靜遠依模糊的記憶將大致曲譜記於正文中，並表示「我要把它記在下面，也許有識者能告訴我它的來歷」（楊靜遠，2000，頁205-206）。母親的聲音

以歌謠形式滲透女兒的書寫和生命，成為女兒原始性的身體記憶，此處描寫令人聯想到《巨》中齊母唱〈蘇武牧羊〉的一幕，與齊母對女兒講述帶有原始體驗象徵的鄉野故事的場面亦有異曲同工之處。可以說，樂律（曲譜）的插入使本就接近意識流的楊靜遠文本，進一步脫離傳統敘述規範，甚至，湮沒於歷史長河的古曲與失聲的知識女性袁昌英、宏大敘事之外的鄉野故事與沈默的傳統女性齊母，以上兩組圖式構成一種跨時空、跨文本的呼應。雖然楊靜遠對母親的情感共鳴並未擺脫國族主義話語干涉，但她的書寫同齊邦媛一樣，是母女生命紐帶的文學體現，並藉此達成對主流意識形態、話語的抵抗。

接到母親死訊時楊靜遠沒有哭，「萬種紛亂無序的感覺中，有一種感覺是明確的：她解脫了，再也沒有什麼能傷害她」（楊靜遠，2000，頁231）。然而，後來得知母親去世前已接到組織撤銷對其的「反革命判處管制」的通知，卻在重獲自由之時離世，她「哭得五臟六腑都要翻倒出來」（楊靜遠，2000，頁232）。在最後，楊靜遠以一份為袁昌英平反的法院刑事判決書結束全文，這個結尾固然是作者藉意識形態力量向「現在」發出的宣告，但相比之前充滿痛悔的敘述，這份姍姍來遲的板平冰冷的文件在母親的悲劇面前甚至顯出些許荒誕效果。

雖然楊靜遠在文章開頭表明寫作的主要動機是為了讓袁昌英的名字重回文壇，但作為女兒她既是敘述者也是與母親同步的歷史經歷者，因此〈母親〉不僅是袁昌英的歷史，更是兩代中國知識女性的命運

寫照。濱田麻矢在論述「革命／共產主義」主題支配下的女性文學²¹所呈現的女性間情誼時提到：「這些女性之間的連結和羈絆是以『黨』這一絕對存在為前提而成立的」（濱田麻矢，2021，頁147）。楊靜遠文章所呈現的正是女性間的自然連結，被絕對存在的「黨」所切斷繼而恢復又再度遭遇切斷的過程。而楊靜遠藉由對母親的書寫保持介於當事者與旁觀者中間的位置，進而完成大歷史敘述下對個體命運的觀照，最終實現母女羈絆的重建，並且透過對五四女性的母親命運的回顧，楊靜遠亦完成對自我的反思和重構。母親的絕望聲音透過女兒的文學迴盪於歷史上空，女兒透過文學彌補母親以及自身未償的心願——走出「山牢」，發出個體的聲音。

肆、結語

《巨》與〈母親〉中，齊邦媛和楊靜遠使用了個人視點的碎片式敘述，由此擺脫時空及主流敘事規範的束縛，她們都描繪了「失語」的母親。不過，從楊靜遠作品中能看出她想要使母親重回文學史冊的願望。這兩部作品不僅展示了兩位後五四知識女性的私人記憶書寫中的母親形象以及母親所處的地位，還展示了母女間的文學影響關係。

《巨》中母親作為傳統女性，她的失聲象徵著舊時代女性主體話語的缺失。不同於女兒精神導師的父親，她帶給女兒的是有關生命、自然、疼痛的文學啟蒙，是女性間的自然情感共鳴。作品中描寫的母

²¹ 濱田氏舉出以40、80代末兩個解放軍入城的歷史事件為背景的兩篇小說，說明歷史背景變化下青年女性的主體性構建、自我抉擇等不再像五四時期那樣受「浪漫愛」（romantic love）意識形態支配，轉而依賴於革命／共產主義信仰這一萬能處方。但濱田氏論述未涉及母女關係。詳見濱田麻矢（2021，頁145-149）。正文引用為筆者譯。

女羈絆正是建立在這樣不受文明、制度束縛的女性間的共感的基礎之上。母親雖站在大時代的外緣，但在女兒的文學之中她牢牢占據屬於自己的位置。

〈母親〉展示的是作為女性文學家的母親形象，她是女兒文學之路的引領人、協助者。袁昌英的失聲是萬馬齊瘖的特殊歷史時期知識菁英群受到極端壓迫的體現，但從女性個體話語的角度來說，她作為五四時期完成自我覺醒的女性，確實因此陷入再度失聲的境地。楊靜遠從個人視角重塑母親形象的同時，也完成與母親、過去的自己的跨時空對話。母女關係由於意識形態介入產生裂變，但女兒透過書寫跨越內心禁制修復母女紐帶，展示兩代知識女性的個體聲音。此外，雖然袁昌英在文革後得到平反，但 80 年代後的中國主流文學史裡依然未見她的位置，由此可見她的文化立場、個人體驗仍被置於主流話語外緣。袁昌英的經歷和文學顯示了一部分五四知識女性的時代與文化抉擇，應得到更進一步的重視，楊靜遠在文章中為母親不斷地吶喊，從文學、學術貢獻到親友回憶等多個角度向世人展示母親的人生歷程及內心²²，使袁昌英這一被淹沒於時代洪流下的知識女性的生命體驗再次浮出歷史地表。

《巨》中，齊邦媛在回顧自己的人生軌跡時母親的人生也隨之得到展現；〈母親〉中，楊靜遠在追溯袁昌英的一生的同時也在進行對自己人生的回顧。齊邦媛與楊靜遠的人生雖然走向相反的方向，但最終卻都以文學為歸宿。從女性知識人的角度來看，可以說，齊邦媛、楊靜遠、袁

昌英分別代表了兩代知識女性在時代風雲下三種抉擇的人生，她們互為鏡像。以這兩部作品為切入點，筆者希望將來能對後五四知識女性的文學進行更深入的挖掘，對齊邦媛與楊靜遠代表的兩岸知識女性迥異的生命體驗達成更加系統性的研究。

參考文獻

- Cixous, H. (1995). 美杜莎的笑聲 (黃曉紅, 譯)。載於張京媛 (主編), *當代女性主義文學批評* (頁 188–211)。北京大學出版社。(原著出版於 1975 年)
- [Cixous, H. (1995). The laugh of Meduse (X.-H. Huang, Trans.). In J.-Y. Zhang (Ed.), *Dangdai nuxingzhuyi wenxue piping* (pp. 188–211).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75)]
- 五七幹校。(2022 年 11 月 29 日)。在維基百科。<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A%94%E4%B8%83%E5%B9%B2%E6%A0%A1>
- [Wuqi Ganxiao. (2022, November 29). In *Wikipedi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A%94%E4%B8%83%E5%B9%B2%E6%A0%A1>]
- 王德威 (2012)。「如此悲傷，如此愉悅，如此獨特」——齊邦媛與《巨流河》。當代作家評論，1，159–166。
- [Wang, D. D.-W. (2012). Ruci beishang, ruci yuyue, ruci dute: Chi Pang-Yuan yu *Juliuhe*. *Contemporary Writers Review*, 1, 159–166.]
- 李孟舜 (2019)。論齊邦媛的自傳書寫與性別主體建構。廣西師範學院學報 (哲學社會科學版)，40 (3)，27–33。
- [Li, M. (2019) On Qi Bangyuan's autobiographical

²² 介紹袁昌英及其作品成為楊靜遠晚期文學活動的重要主題之一。2002 年，由楊靜遠編選的《飛回的孔雀——袁昌英》出版，該書收有 20 多篇楊靜遠及其他文人、親友所寫的袁昌英紀念文章，是袁昌英研究裡重要的文獻。

- narration and gender entity construction. *Journal of Guangxi Teachers Education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3, 27–33.]
- 李玲 (1998)。青春女性的獨特情懷——「五四」女作家創作論。《文學評論》，1，52–62。
- [Li, L. (1998). Qingchun nuxing de dute qinghuai: “Wusi” nuzuo jia chuanguo lun. *Literary Review*, 1, 52–62.]
- 李城外 (2008)。楊靜遠：我為什麼要寫《煉人學校》？《湖北檔案》，8，32–33。
- [Li, C.-W. (2008) Yang Jingyuan: Wo weishenme yao xie Lianren Xuexiao? *Hubei Archives*, 8, 32–33.]
- 李建立 (2012)。《巨流河》：大時代的表情、呼吸與體溫。《當代作家評論》，1，166–170。
- [Li, J.-L. (2012). *Juliuhe*: Dashidai de biaoqing, huxi yu tiwen. *Contemporary Writers Review*, 1, 166–170.]
- 周慧珠 (2009)。我們為什麼需要知識分子——《巨流河》齊邦媛的文學不了情。《人間福報》。https://www.merit-times.com.tw/NewsPage.aspx?Unid=135266
- [Chou, H.-C. (2009). *Women weishenme xuyao zhishifenzi: Juliuhe Chi Pang-Yuan de wenxue buliaoqing*. The Merti Times. https://www.merit-times.com.tw/NewsPage.aspx?Unid=135266]
- 袁昌英 (1925)。玫君。《小說月報》，16 (3)，1–12。
- [Yuan, C.-Y. (1925). Meijun. *The Short Story Magazine*, 16(3), 1–12.]
- 袁昌英 (1935)。春雷之夜。《文藝月刊》，7 (1)，11–23。
- [Yuan, C.-Y. (1935). Chunlei zhi ye. *Wenyi Yuekan*, 7(1), 11–23.]
- 袁玲麗 (2018)。以文學之舟涉渡：《巨流河》的女性成長主題探析。《中國石油大學學報 (社會科學版)》，34 (4)，94–98。
- [Yuan, L. (2018). On the ark of literature: The female initiation theme in the Grand River. *Journal of China University of Petroleum (Edition of Social Sciences)*, 4, 94–98.]
- 唐姆嘉 (2019)。《巨流河》：回憶詩學視域下「戰爭、成長與流亡」的三重變奏。《粵海風》，5，62–68。
- [Tang, Y. (2019). The giant river: A trio variation of war, growth and exile on the perspective of recollection poetics. *Yuehaifeng*, 5, 62–68.]
- 徐德榮、王琳 (2022)。對文學性的堅守：楊靜遠兒童文學翻譯思想研究。《外國語文研究》，1，67–77。
- [Xu, D., & Wang, L. (2022). Pursuit of literariness: A study of Yang Jingyuan’s thoughts on children’s literature translation. *Foreig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Research*, 1, 67–77.]
- 張在軍 (2017)。蘇雪林和她的鄰居們：一條街道的抗戰記憶。福建教育出版社。
- [Zhang, Z.-J. (2017). *Su Xue-Lin he ta de linjumen: Yi tiao jiedao de kangzhan jiyi*. Fujian Education Press.]
- 張學昕、梁海 (2013)。時間之上：「非虛構」的歷史與人生——齊邦媛的《巨流河》與「非虛構」寫作。《南方文壇》，2，24–29。
- [Zhan, X.-X., & Liang, H. (2013). Shijian zhi shang: “Fei xugou” de lishi yu rensheng—Chi Pang-Yuan de *Juliuhe* yu “fei xugou” xiezuo. *Southern Cultural Forum*, 2, 24–29.]
- 陳建軍、戚慧 (2023)。袁昌英年譜。商務印書館。
- [Chen, J.-J., & Qi, H. (2023). *Yuan Chang-Ying nianpu*. The Commercial Press.]
- 許紀霖 (2003)。20 世紀中國六代知識分子。

- 載於許紀霖（著），《中國知識分子十論》（頁79–87）。復旦大學出版社。
- [Xu, J.-L. (2003). 20 shiji zhongguo liudai zhishifenzi. In J.-L. Xu (Ed.), *Zhongguo zhishifenzi shilun* (pp. 79–87). Fudan University Press.]
- 戚慧（2021）。作為自傳的寫作——評齊邦媛《巨流河》。寫作，1，96–101。
- [Qi, H. (2021). Writing as an autobiography comment on Qi Bangyuan's *Juliu River*. *Writing, 1*, 96–101.]
- 單德興（2016）。齊邦媛——臺灣文學的國際推手。載於單德興（編），《臺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 68：齊邦媛》（頁167–174）。國立臺灣文學館。
- [Shan, T.-H. (2016). Chi Pang-Yuan: Taiwan wenxue de guoji tuishou. In T.-H. Shan (Eds.), *Taiwan xian dangdai zuojia yanjiu ziliao huibian 68: Chi Pang-Yuan* (pp. 167–174). National Museum of Taiwan Literature.]
- 楊靜遠（1943）。縈。民族文學，1（4），14–35。
- [Yang, J. (1943). Ying. *Minzu Wenxue, 1*(4), 14–35.]
- 楊靜遠（2000）。咸寧幹校一千天。長江文藝出版社。
- [Yang, J. (2000). *Xianning ganxiao yiqian tian*. Changjiang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 楊靜遠（2015a）。讓廬日記：1941–1945。商務印書館。
- [Yang, J. (2015a). *Rang lu riji: 1941–1945*. The Commercial Press.]
- 楊靜遠（2015b）。寫給戀人：1945–1948。商務印書館。
- [Yang, J. (2015b). *Xie gei lianren: 1945–1948*. The Commercial Press.]
- 沈雲龍、林泉、林忠勝（1990）。齊世英先生訪問紀錄。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 [Shen, Y.-L., Lin, Q., & Lin Z.-S. (1990). *The reminiscences of Mr. Shih-Ying Chi*.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
- 齊邦媛（2020）。巨流河。天下文化。
- [Chi, P.-Y. (2020). *The great flowing river: A memoir of China, from Manchuria to Taiwan*. Global Views-Commonwealth Publishing Group.]
- 劉星、王明亮（2022）。少爺小姐為什麼傾心革命？——以民國女大學生楊靜遠為個案的考察。廣東社會科學，5，123–134。
- [Liu, X., & Wang, M. (2022). Why do young masters and ladies in ROC be inclined to a leftward shift in politics? — A case study centered on a female college student Yang Jingyuan. *Social Sciences in Guangdong, 5*, 123–134.]
- 劉劍梅（2014）。革命與情愛：二十世紀中國小說史中的女性身體與主題重述（郭冰茹，譯）。釀出版。（原著出版於2003年）
- [Liu, J. (2014). *Revolution plus love: Literary history, women's bodies, and thematic repetition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ese fiction* (B.-R. Guo, Trans.). Showwe Information.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2003)]
- 濱田麻矢（2021）。少女中国：書かれた女学生と書く女学生の百年。岩波書店。
- [Hamada, M. (2021). *Girl's China: Female bildungsroman in 20th century*. Iwanami Shoten.]
- 繆作林（2021）。從何處來？往何處去？——小說《巨流河》中的身份問題研究。常州工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39（4），22–26。
- [Miao, Z. (2021). Where are they from? Where are they going? — Research on the identity issue in *The Great Flowing River*. *Journal of*

Changzhou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39(4), 22–26.]

羅惜春（2015）。袁昌英評傳。湘潭大學出版社。

[Luo, X.-C. (2015). *Yuan Chang-Ying pingzhuan*. Xiangtan University Press.]

龔潤枝、昌切（2022）。袁昌英在現代社會轉型中的文化選擇。湘潭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46（5），133–138。

[Gong, R.-Z., & Chang, Q. (2022). Changying Yuan's cultural selection 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modern society. *Journal of Xiangtan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46(5), 133–138.]